

第五章 兩岸大學生的對比：社會化媒介影響、人格特質差異和政治參與意向之比較

如同民主政治並非從天而降的一種政治制度，民主意識也非個人與生俱來的本能傾向，而是經由生活經驗學習而來。外在社會化環境和內在人格特質都可能影響一個人如何攝取政治相關訊息，與對政治產生特定的想法或作為。依照 Almond 和 Verba 的（張明澍譯，1996：298）的看法：「早期社會化的經驗，顯著地影響到個人的基本人格傾向，因此可能影響到他的政治行爲」。這種影響可能極爲複雜，也可能若有似無，有待檢驗。

本文第四章發現兩岸大學生在若干民主意識的分量表上存在顯著的差異，本章希望進一步探討他們所接觸之政治社會化媒介情形如何、他們具備怎樣的人格特質以及他們在政治參與意向上是否也產生差異。這些問題將分別於本章前三節中討論，並檢驗本研究相關假設是否成立。第四節總結本章發現。

第一節 兩岸大學生接觸政治社會化媒介的情形

Lasswell 對政治社會化所提出的五個基本問題中，提到有關自何人學習一項，亦即本文所謂之政治社會化媒介。Jaros 指出：「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就是政治學習的研究」（引自陳義彥，1977：4）。人們進行政治學習的途徑有很多種，如直接教導或灌輸、面對面溝通、觀察、模仿及認同等等。關於政治學習的內涵，Greensten 認爲是個人一般政治反應及政治內容的學習，前者包括影響政治行爲之基本傾向、信念與態度；後者則指：（1）與公民角色有關的學習（如政黨的色彩、政治意理及參與動機）；（2）與主體角色有關的政治學習（如對國家之忠誠、對權力的定向等）；（3）與特殊角色有關的學習（如政府官僚、政黨工作人員等）（陳漢卿譯，1973：18）。

所有社會都有很多用以發展並傳遞其成員的政治知識、態度及價值的機構或媒體，這些不同的社會機構或媒體便是政治社會化媒介。有的機構是爲傳遞政治價值、發展政治知識與支持某特殊目的，所作的政治安排而成立的，如政黨、學校中的公民和政治教育課程。但有些政治社會化過程則是在非政治性的機構裡，進行傳遞政治定向的工作，如家庭、同儕團體、宗教或社會團體等（陳義彥，1977：126）。林嘉誠（1987：237）指出政治社會化

的機構，涵蓋了家庭、學校、大眾傳播媒介、同儕團體、外來文化與執政黨、黨外政團等政治團體，其間包含顯性與隱性的政治社會化，也包含了有計畫與無計畫的政治學習。

在諸多政治社會化媒介中，比較具有影響力的是家庭、學校、同儕團體、與大眾傳播媒介。這些媒介對社會成員在社會化過程中，較具有形塑態度的效果，且對社會成員的個人政治學習與政治教育內涵有明顯的影響。因而 Greenstein 認為這四者是普遍被接受的重要媒介。這四個媒介也是本研究測量的重點。

本研究參考彭立忠(1985)等人的量表，編製成測量兩岸大學生政治社會化媒介的量表，設計的問題位於問卷的第三部份。在這一節有待檢驗的是：假設四「兩岸大學生受不同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影響的情形是不同的」。針對四種社會化媒介，分述成四個子假設：

假設四之 1：兩岸大學生的家庭政治社會化情形是不同的。

假設四之 2：兩岸大學生的學校政治社會化情形是不同的。

假設四之 3：兩岸大學生的同儕團體政治社會化情形是不同的。

假設四之 4：兩岸大學生的大眾傳播媒介政治社會化情形是不同的。

以下分點敘述各媒介對受測者政治社會化的影響。

壹、家庭政治社會化

家庭是各人所屬最具深厚感情與密切利益關係的「原級團體」(primary group)，個人在其間，彼此互動頻繁，其相互影響的普遍與深遠是可見的(陳文俊，1983：153-154)。但政治社會化相對於一般的社會學習而言，是屬於特殊的社會化，家庭在期間是否仍舊扮演著實質角色？在多樣化的家庭成員互動中，何者與民主意識具有關聯？均有待探討驗證。

一、家庭媒介對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性

政治學家研究家庭，旨在分析家庭如何影響其成員的政治態度及價值。海曼(H. H. Hyman, 1959: 51)指出：家庭是所有政治社會化機構之中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接觸環境。家庭是個人出生後，所最先接觸到之社會環境，是社會組織中最基本的單位、文化的轉運站、生活的根據地和行為的養成所、孵化政治人的溫室及陶育政治行為的場地(林水波，1973：89)。

在家庭的人際關係中，父母親的角色最特殊。如 Paul Allen Beck & M. K. Jennings (引自鄧文勤，1995：42)認為在兒童的政治社會化中，父母扮演的是一個「中間人」(middle man)，是兒童政治態度的主要來源。國內外研究政治社會化的學者發現，育兒方式與個人對政治系統的積極情感或消極感

覺有密切關係，家庭裡容許成員發表意見及成員處於平等地位的權威模式，與個人對政治積極態度有關聯。相反地，過份限制或過份保護的權威模式與個人對政府的猜疑及敵意有關係(張明澍譯，1996：260-262)。袁頌西(1969：222)認為家庭對其成員權威態度的形成，最具影響性，因為家庭在日常生活中，必會作些集體的決定，而由於潛在制裁(即父母對子女的制裁)的影響，導致這些決定具有權威性並且這也將影響到其未來成為公民時的表現。

一般家庭大多數並非有計畫的從事政治社會化，父母會告訴子女做人處事的道理，但不一定會告訴子女有關政治的事務。或許家庭的政治社會化是隱式的，非計畫性的，然而我們仍不能忽視家庭政治社會化所扮演的功能，這是因為：首先、一般家庭社會化過程可能間接具有政治社會化功能，如父母告訴子女需容忍異己，可能促進子女的民主心態；第二、家庭的權威模式，如父母的管教方式、決策模式，被證明對子女的政治能力感、民主心態、權威人格有所影響；第三、社會化與政治社會化無法硬性區分，社會化結果對於政治社會化效果有所影響；第四、社會化與政治社會化或有差異，家庭政治社會化的程度對子女的政治學習有所影響；最後、家庭是幼兒時期唯一的學習環境，家庭對子女的基本人格、價值觀、行為模式起碼對個人政治人格、政治價值觀、政治行為模式有間接的影響(林嘉誠，1987：237-238)。

二、家庭政治社會化的因素分析

本研究對兩岸大學生家庭社會化所設計的量表共有五題，經由因素分析的方法抽取出兩個因素，見表 5-1。分別命名為「家庭政治化」和「家庭民主模式」，這兩方面的因素包含了家庭在政治社會化方面的功能。兩個因素共可以解釋變異量的 58.839%。兩岸大學生對具體測量變項的作答情形和量表的獨立樣本 T 檢定分別如表 5-2 和 5-3 所示。

表 5-1：兩岸大學生家庭政治社會化的因素分析

題號	測量變項	抽取因素		共同性
		因素一	因素二	
		家庭民主模式	家庭政治化	
3-11	與您自己有關的事務（例如：升學、就業、交友），您的父母親通常會接受您的意見或決定嗎？	.732	9.295E-03	.566
3-12	當您對家中的事物不滿時，您能毫無困難的向父母親說嗎？	.723	.233	.527
3-14	您與父母談論政治方面的問題，他們會接受您的意見嗎？	.697	.383	.534
3-13	您是否時常與父母親談論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例如：選舉、我們的政府）	.424	.723	.588
3-15	您的父母有經常參與有關公眾的活動嗎？（例如：參加社團、投票等）	7.719E-02	.842	.726

表 5-2：兩岸大學生家庭政治社會化量表的作答情形

因素名稱	問卷題號	樣本群組	從不或 都是一言不發		很少或 很少說出來		有時或有點困難 但仍會說		時常或 毫無問題	
			N	%	N	%	N	%	N	%
家庭民主模式	3-11	台灣	2	0.4%	37	6.7%	181	32.7%	333	60.2%
		大陸	2	0.3%	31	5.2%	109	18.4%	451	76.1%
	3-12	台灣	4	0.7%	102	18.4%	250	45.2%	197	35.6%
		大陸	5	0.8%	64	10.8%	230	38.9%	293	49.5%
	3-14	台灣	11	2.1%	104	19.5%	310	58.1%	109	20.4%
		大陸	9	1.6%	82	14.4%	324	56.9%	154	27.1%
家庭政治化	3-13	台灣	39	7.1%	198	35.9%	226	41.0%	88	16.0%
		大陸	49	8.3%	179	30.3%	260	44.0%	103	17.4%
	3-15	台灣	40	7.2%	184	33.3%	221	40.0%	107	19.4%
		大陸	72	12.1%	255	43.0%	203	34.2%	63	10.6%

註：N 代表選此種意見的有效樣本數，%代表有效百分比。

表 5-3：兩岸大學生家庭政治社會化獨立樣本 T 檢定

因素名稱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台灣	大陸	台灣	大陸	台灣	大陸	t 值	p 值
家庭民主模式	534	568	9.655	10.179	1.478	1.436	5.950	.000***
家庭政治化	551	591	5.376	5.140	1.330	1.387	-2.921	.004**

註：*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1. 家庭民主模式

家庭民主模式這一因素中包含三道題，回答依「從不接受、很少、有時、時常接受」分別得 1、2、3、4 分。此量表的總分由 3 分至 12 分，得分中位數是 7.5 分。得分高於中位數愈多，表示家庭成員間相處的模式愈民主。台灣受測大學生的得分平均數是 9.655，標準差是 1.478，大陸樣本的得分平均數和標準差則分別是 10.178 和 1.436。可見，兩岸大學生的家庭成員互動的模式都是合乎民主指標的。

段盛華（1988）發現台灣五專大學生的在「家庭權威模式」（即本研究之家庭民主模式）上得分趨於中高（平均分數是 18.1，中位數是 16）。學者陳義彥（1991）的研究卻發現：台灣大學生家庭民主模式並不高，得分平均數是 6.62（低於中位數 7 分）。時隔十數年，本研究中大學生在家庭民主模式，相較於前二者之發現有所提高，可見台灣十幾年來在家庭民主氣氛的培育上有了很大的進展，這和現代家庭結構多為小家庭形式，成員間容易溝通有關。

進一步比較兩岸的家庭互動模式有何差異，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得知，大陸大學生的家庭內民主程度比台灣家庭來得高（ $p < .001$ ）。針對兩岸受測者對具體測量問題的態度來看，在 3-11 題，大陸大學生認為對自己交友、就業的意見，父母會接受的比例高達 94.5%（含「時常接受」和「接受」的有效百分比），比台灣還要高出一點（92.9%）。這和張善楠（2000）對亞洲四地（台灣、香港、大陸、新加坡）大學生的調查發現一致，張氏當時的研究結果是：台灣大學生在作人生大事的決定（婚姻、工作）時，比大陸大學生更重視父母的意見。

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兩岸對傳統文化中尊親觀念的保留有所不同，中共推翻了傳統中國社會中的父權家庭結構，「社會主義新型家庭」塑造的是父母和子女的平等關係。二是本研究所調查之大陸大學生可能多為家中獨子或獨女，考取之大學皆為全國名校，這層光環不但令父母感到榮耀，自然也會提高了大學生在家庭中說話的份量。在這樣的情形下，學生在家庭內親子互動的模式可能會比較民主。

2 . 家庭政治化

依照 K.P. Langton 的說法，家庭政治化係稱家庭中父母或家長對於政治感覺到興趣，並經常討論政治及參與政治活動之意 (Langton,1969: 144)。本文「家庭政治化」這一因素包含兩個測量變項，得分總分從 2 到 8 分，得分中位數是 5。得分越高，代表家庭的政治化程度越高。台灣大學生的得分平均數是 5.376，大陸大學生則平均得分 5.140，兩岸的標準差分別是 1.330 和 1.387，表明兩岸受試者家庭的家庭政治化程度達中等。學者陳義彥 (1991 : 74) 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大學生在家庭政治化方面的得分是 8 分 (中位數是 7.5)，家庭政治化程度屬於中等，與本文類似，這十年來台灣一般家庭的政治化並未有太大改變。

經過獨立樣本 T 檢定得知，兩岸樣本間差異達顯著 ($p < .001$)，即台灣大學生的家庭比大陸大學生之家庭對政治投入會多一些。從具體變項來看，在父母的政治參與上，大陸受測大學生回答「時常參與」和「有時」者尚不足一半(44.8%)，台灣大學生的回答則有 59.4%；但在和父母討論政治問題上，則大陸學子所佔的比例 (61.4%) 比台灣 (57%) 稍高一點。可見，兩岸家庭政治化的情形是不同的，台灣大學生家庭談論和參與政治都比較積極，大陸只在議論政治上有比較高的熱情，涉及到具體的政治行為則明顯減少。這和兩岸的政治現實有關，如上一章所述，大陸民眾的政治參與自由程度並不像在台灣社會那麼多樣和自由，所以即使民眾對政治有熱情，也難以真正投入政治活動或團體中。

綜上所述，大陸大學生的家庭民主化程度比台灣高，台灣大學生家庭政治化程度比大陸高，所以兩岸在家庭政治社會化方面的情形是有差異的。

貳、學校政治社會化

政治社會化若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是與民主生活有關知能和規範的學習，同時也是使個體自主空間擴展的過程 (陳伯璋，1988 : 20)。Freed Newnan 指出政治教育程度的總目標首在增加學生對公共事務的影響能力，使學生在從事政治生活時，能夠利用他的知識與技巧。唯有具備政治的能力，從事有意識的政治活動 (引自陳文俊，1983 : 211)。

一、學校政治社會化的意義

自古以來，幾乎所有階層，都會利用各種管道培養年輕一代對體系的認同感，傳遞給他們社會的共同價值和規範，以維持體系的安定和持續發展 (江炳倫，1988 : 29) 無論是西方的柏拉圖還是東方的孔夫子，都主張透過教化來達到穩定政治的目的。每一個國家均在其既定的政策、目標和政治理想的

指引下，通過學校教育，來塑造個體的政治信仰與政治人格，以形成個體在政治上的行為定向及模式（林水波，1973：135）。

尤其是在快速變遷的東方社會，其學校教育比西方社會更重視政治教育。理由是爲了對抗家庭的傳統教育及賦予兒童新的國家意識。特別是當政府領袖察覺到社會中存在潛在的政治不穩定，公民教育往往成爲有計畫的政治學習，而學校就必須執行許多通常由其他機構擔任的功能（R. W. Wilson，朱雲漢、丁庭宇譯，1981：13）。所以，學校教育不僅教育學生在文化方面所認可的政治規範與政治角色，而且也在灌輸愛國思想與支持國家制度等。

二、學校政治社會化的特徵

學校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運作，與家庭及友伴團體是不同的。家庭及友伴團體對被社會化者進行政治社會化時，是在分散的、非刻意的及偶然的情況下進行，而學校對學生的社會化則是在集中及統一控制的情況下進行的。學校常成爲當政者遂行一套統一的政治教育計畫的工具，將共同的政治價值和資訊以非常統一的方式傳播給全國的年輕人（Dawson & Prewitt, 1969：178）。因而學校所進行的政治社會化，比起家庭及同儕團體更有計畫，執政者常透過特殊政治內容的教育課程、統一的師資、統一的教科書，刻意教導特殊的政治態度和行為傾向，不管是公民訓練，思想教化，甚至對特定人士進行洗腦，可說所有社會的教育目標，都在培育年輕人的態度與行為傾向，以支持他們所生活的社會（Coleman, 1965：23）。

儘管學校能以較爲統一、控制和集中的方式來進行政治社會化，但是通常並不能達到完全統一與控制的預期效果。教育計畫和執行意向的統一，很少意味著教育效果和應用的統一。即使是最集中化的學校制度，也難於操縱所有教室裡溝通的政治訊息。即使是實行統一的教科書、統一的教學進度，但綜合到不同教師授課方式、不同課堂環境，便使得政治社會化的效果無法統一。何況更存在學生的差異性，接受政治訊息的程度也就互有差異了（Dawson & Prewitt, 1969：179）。

所以關於學校在政治社會化中的角色，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莫衷一是。如美國學者 Hess 與 Torney（1967: 247-248）在研究兒童政治態度的發展時，覺得「有關對政治系統運作的態度、概念與信仰的社會化，學校顯然是最有力的機構。」但是 Langton 和 Jennings 對美國高中學生的調查卻發現，中產階級樣本顯示學校與政治社會化的關係微弱，甚或毫無相關，而對於黑人樣本而言，學校對於政治社會化確有較深的影響（引自陳義彥 1977：145）。這顯示出，「有關一般學校與特殊課程對於政治社會化的實際影響之評價，已經產生爭論及不一致的結果」（Jennings & Niemi, 1974:182）。這種結果的差異或許在歐美先進民主國家比較容易出現，但在亞非等開發中國家，學校可能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這些開發中國家常運用學校的儀式活動來灌輸愛國主義

和奉獻國家的意識 (Farnen & German, 1974: 330)。

三、學校政治社會化的因素分析

本文在第三章已分析兩岸高中教科書的政治內涵，從靜態角度觀察兩岸學生政治知識的儲備以及政治觀念的獲取，在本節則從動態角度分析，側重從大學生在學校與老師關於政治議題的溝通情形、在學校參與政治性青年組織及課外活動的情形這兩個範疇，來探討學校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角色。

相關的問題經過因素分析，抽取出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學校民主化」和「社團參與度」，如表 5-4 所示。該量表共可解釋總變異量的 57.354%。表 5-5 是兩岸大學生在學校政治社會化量表上的作答情形，表 5-6 則為對比兩岸大學生在學校政治社會化的平均值差異，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表示。

表 5-4：兩岸大學生學校政治社會化的因素分析

測量變項	抽取因素		共同性
	因素一 學校民主化	因素二 社團參與度	
3-18.您當過班級幹部或學生幹部的次數有多少？ (按學期算，包括高中時代)	-1.020E-02	.749	.576
3-20.您認為自己在學校的課外活動參與度是怎樣？	.226	.776	.611
3-21.在校中，如果與老師有不同意見時，您能毫無困難的向老師說嗎？	.532	-.512	.465
3-22.在課堂上或課堂下，您是否常與老師談論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例如：選舉、我們的政府)	.813	-.251	.673
3-23.您是否時常加入有關政治的討論？	.816	-.248	.677
3-24.在政治的討論中，學生的意見會受到重視嗎？	.614	.139	.438

表 5-5：兩岸大學生學校政治社會化量表的作答情形

因素名稱	問卷題號	樣本群組	從不或 都是一言不發		很少或 很少說出來		有時或有點困難 但仍會說		時常或 毫無問題	
			N	%	N	%	N	%	N	%
學校民主化	3-21	台灣	39	7.1%	275	49.8%	194	35.1%	44	8.0%
		大陸	29	4.9%	227	38.5%	251	42.5%	83	14.1%
	3-22	台灣	269	48.8%	217	39.4%	54	9.8%	11	2.0%
		大陸	155	26.3%	277	46.9%	124	21.0%	34	5.8%
	3-23	台灣	126	22.9%	292	53.1%	114	20.7%	18	3.3%
		大陸	60	10.2%	232	39.4%	237	40.2%	60	10.2%
	3-24	台灣	26	4.8%	214	39.1%	271	49.5%	36	6.6%
		大陸	26	4.5%	178	30.5%	296	50.8%	83	14.2%
社團參與度	3-18*	台灣	15	2.7%	211	38.3%	190	34.5%	135	24.5%
		大陸	37	6.2%	217	36.6%	125	21.1%	214	36.1%
	3-20	台灣	51	9.3%	211	38.6%	250	45.7%	35	6.4%
		大陸	49	8.3%	261	44.2%	220	37.3%	60	10.2%

註：N 代表選此種意見的有效樣本數，%代表有效百分比。*3-18 題之測量刻度分爲：一次也沒有、1~3 次、4~6 次、七次以上。

表 5-6：兩岸大學生學校政治社會化獨立樣本 T 檢定

因素名稱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台灣	大陸	台灣	大陸	台灣	大陸	t 值	p 值
學校民主模式	545	582	8.719	9.993	1.983	2.251	10.055	.001***
社團參與度	547	590	5.302	5.368	1.299	1.415	.822	.411n.s.

註：* p<.05； **p<.01； ***p<.001。n.s.表示統計上無顯著意義。

1. 學校民主模式

在學校民主模式這一因素中包含四個測量變項，回答依程度從弱到強劃分爲四個刻度，分別得 1、2、3、4 分。此量表的總分由 4 分至 16 分，得分中位數是 10 分。得分高於中位數愈多，表示學校的政治化程度越深，政治氣氛越濃厚。台灣受測大學生的得分平均數是 8.719，標準差是 1.983，大陸樣本的得分平均數和標準差則分別是 9.993 和 2.251。顯示兩岸大學生在學校民主化的反應數值屬於中等偏低。依據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台灣大學生的

學校民主化程度比大陸大學生要來得低，兩者達到統計的顯著性。這點可能會讓我們感到汗顏，因為兩岸受試者用相同的題目詢問在學校與師長、同學的互動方式，結果居然大陸學生的互動模式較台灣學生來得民主。對照學者陳義彥（1991：83）的調查，台灣大學生在學校的民主模式方面得分平均數 6.62 分（低於中間值 7），同本研究一樣都偏低。是否意味著台灣社會最近十幾年來，高等院校的學習氣氛民主化程度未見提升，非常值得學校當局與研究者的重視，期能在學校民主化方面多下功夫。

若從受測者對每一測量變項的具體態度來看，3-21 在和老師溝通歧見方面，大陸學生顯得比台灣學生要自信的多，認為「毫無問題」或是「有點困難但仍會說出口」的人共計 56.6%，台灣只有 43.1%，不足一半，而 56.9% 的人則是選擇「很少說出來」或「不說」，可見台灣大學生對老師的權威仍存有比較深的敬畏與壓抑，或許和台灣仍保留尊師傳統有些關係。

不過兩岸大學生在課堂上或課堂下跟老師討論政治問題的頻率都比較低，台灣學生中「時常談」和「有時談」的有效百分比合計只有 11.8%，大陸也只有 26.8%。可見老師並非學生私下談論政治的對象。在這有限的討論中，台灣同學加入的頻率是很低的，「時常」跟「有時」只佔 24.0%，大陸剛剛過半（50.4%）。縱然會加入討論的人不多，但是在此種討論中，兩岸學生還是有多數認為學生的意見會受到重視（台灣有 56.1%，大陸有 65%）。也就是說，學生在學校雖不會很主動和老師溝通，但老師會重視學生的意見。

2. 社團參與度

社團參與度包含兩個測量變項，按照參與從少到多，分別得 1、2、3、4 分。此量表的總分由 2 分至 8 分，得分中位數是 5 分。得分高於中位數愈多，表示社團參與度越強，參與越積極。台灣受測大學生的得分平均數是 5.302，標準差是 1.298，大陸樣本的得分平均數和標準差則分別是 5.368 和 1.415。兩岸大學生的社團參與度中等偏高。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兩岸大學生的社團參與度之間差異並不顯著（ $p>.05$ ）。

在具體測量變項 3-18，以「4~6 次」和「7 次以上」為比較多，「1~3 次」和「一次也沒有」者算比較少。統計結果顯示，台灣 59.0% 的大學生當過比較多次的學生幹部，大陸也有 57.2% 的受測者當幹部的次數屬於比較多的。在 3-20 題，認為自己課外活動的參與是活躍（含「很活躍」與「還算活躍」）的台灣大學生佔 52.1%，大陸大學生佔 47.5%。從這兩點可以看出，兩岸大學生在學校對社團參與是比較積極的。在問到所參加社團的類型時，台灣比較多學生參加的是：學藝性的（31.6%）、康樂性的（22.0%）和服務性的（19.8%）；大陸學生比較傾向於參加：服務性的（25.4%）、學藝性的（24.8%）和學會或代聯會（15.5%）。這種差別和兩岸大學社團生態的不同有關，台灣

的社團種類繁多，學生可以各取所需；而大陸大學內比較有影響力的則是學生會和青年志願者協會（服務性的）。但無論是哪種社團，它都會對學生獲取適合於成人社會生活所需的技能提供幫助。

綜上所述，兩岸大學生在校園民主氛圍的對比上，大陸比台灣更為正向；但兩岸大學生在社團參與方面則無差異，都是積極正面的。

參、同儕團體政治社會化

所謂同儕團體是指家庭以外，由年紀相仿、社會地位相若、接觸頻繁、關係密切等所組成的人群。童年的玩伴、同學、鄰居、工作伙伴等都屬於友伴性質的團體。人們常常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句東方古諺傳遞的正是西方「同儕團體社會化」的意涵。

一、同儕政治社會化的必要性

在現代社會裡，由於社會、經濟急速變遷的結果，父母無法提供子女外在世界所需的知識與技術，子女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在學校，與同儕團體在一起，反而跟家人，在一起的時間變的少了。加之，同儕團體年齡相仿，心智發育水準相若，生活經驗亦比較有共通性，同儕之間較易引起共鳴。James Coleman 研究美國青年文化時證實了此點，他認為在青年時期，同儕成爲美國青年最重要的「參照對象」(reference figure)，取代了父母與老師(Coleman, 1965: 129)。

同儕團體政治社會化角色具備重要性，可以歸納爲以下三個原因（陳文俊，1983：177）：

- (1) 同儕團體屬於「原級團體」，同儕之間接觸頻繁，容易產生「社會從眾」(social conformity) 傾向，在認知、信仰、判斷及行爲上，往往與團體中的多數人趨於一致；
- (2) 同儕團體的關係密切，彼此具有情感基礎，容易相互影響，認同或模仿對方的態度；
- (3) 同儕團體的政治社會化，每多以無意識、間接的方式進行。同儕之間偶然的政治討論，互相提供意見，彼此交換意見，無意中獲得個人的政治態度。

二、同儕團體社會化的影響

社會心理學家發現，同儕團體的青年人和成人的社會化，在特殊型式的社會裡特別重要。林嘉誠（1987：252）曾指出，同儕團體對於青少年個人的人格成長、行為模式有甚大的影響力。本研究之對象大學生，年紀約在 16 歲至 25 歲之間，正處於青春階段，剛脫離父母呵護的懷抱，卻並未真正踏入社會，尚缺乏歷練和經驗，社會視其既非孩童又非成年，這種角色認知的差異使此一時期的青年易有叛逆的舉動出現，更願意接受同儕而非父母或學校的意見，所建立之朋友圈也多由同學構成。

由於同儕的社會地位、利益相近，信仰大致相同，且有某種共同的志趣，所以對一個人終生的政治社會化都有莫大的影響。同伴往往加強本人已有之政治信念、價值觀念和期望。大陸學者趙渭榮（2001：45）認為，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作用較為明顯的同儕群體是青年團體，尤其是學生的團體，包括正式團體和非正式團體。他以大陸的青年團體為例，指出在正式的青年團體如學生會、青年政治組織中，青年可以學到更為深刻、同時又更為具體的政治知識，獲得更為生動和實用的政治經驗，形成更為明顯的政治認同感和價值觀。這類社會團體在幫助甚至加速青年政治文化形態基本定型方面有著重要作用。非正式團體具有一種自發形成卻是十分深沈的統合意識，從而使成員間的個性品質、人生觀和從各自家庭影響中所帶來的政治期望產生潛移默化、但又效果顯著的互相影響，強化他們以往所接受的政治方面的傾向性。高中時代的同儕影響往往超過家庭和學校的政治課程。

三、同儕團體政治社會化分析

對於同儕團體的政治社會化，本研究設計的題目關注在同儕之間對政治訊息的關注和交流，題目敘述是：3-16. 您是否時常與您的朋友或同學談論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例如：選舉、我們的政府）。因素命名為「同儕政治化」。受測者的回答從「從不談」、「很少談」、「有時談」、「時常談」四種程度分別得 1、2、3、4 分，故得分中位數是 2.5。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見表 5-7。

表 5-7：兩岸大學生同儕政治社會化獨立樣本 T 檢定

因素名稱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台灣	大陸	台灣	大陸	台灣	大陸	t 值	p 值
同儕政治化	551	591	2.419	2.965	0.734	0.766	12.283	.000***

註：* p<.05； **p<.01； ***p<.001。

從表 5-7 可以看出，大陸大學生的得分則高於中位數（2.5），也高於台灣大學生的平均數，顯示兩岸同儕政治化的影響程度有顯著差異（ $p < .001$ ）。學者陳義彥（1991）也調查過台灣大學生的同輩團體政治化，發現屬於中等程度，平均得 15.51 分（中位數是 14 分），與本文發現類似，台灣大學生同儕間在政治方面的影響一般。並未像祝基滢（1982）指出的那樣：「青年階段之同伴，對於獲得政治能力以及與青年人有關之政治問題的意見，更有極大的影響力。」

從受測者在這一題回答的情形（表 5-8）可以看出台灣大學生不如大陸大學生那麼熱衷與同儕團體討論政治，台灣學生和同儕談論政治的頻率比較高的人佔 43.2%（合計「時常談」和「有時談」之人），大陸學生則高達 73.9% 會和同儕談論政治。綜合家庭、學校師長與同輩團體對個人政治態度可能的影響輕重，依序是父母、同儕、師長。而大陸學生則是同儕、父母、師長。

表 5-8：兩岸大學生的同儕談論政治的頻率

談論政治 頻率	台灣		大陸	
	N	%	N	%
時常談	37	6.7%	148	25.0%
有時談	201	36.5%	289	48.9%
很少談	269	48.8%	139	23.5%
從不談	44	8.0%	15	2.5%

註：N 代表選此種意見的有效樣本數，% 代表有效百分比。台灣有效樣本人數是 551，大陸有效樣本人數是 591。

問卷中有特別問到：「平常同學或朋友之間有不同意見時，你們如何處理這種爭論？」，並列了四種處理方式做選項，兩岸大學生的回答情形如表 5-9。

表 5-9：兩岸大學生同儕間歧異處理方式表

同儕歧異 處理方式	台灣		大陸	
	N	%	N	%
請師長仲裁	1	0.2%	12	2.0%
大家討論，投票決定	190	33.9%	165	27.9%
不討論，由某一個人決定	18	3.2%	21	3.6%
沒有一定的處理方式	340	60.7%	393	66.5%

註：N 代表選此種意見的有效樣本數，% 代表有效百分比。台灣有效樣本人數是 549，大陸有效樣本人數是 591。

可見，當同儕之間意見出現分歧時，六成以上的受試者選擇「沒有一定的處理方式」，解決問題的模式不固定、多樣化。次多被採納的是「大家討論，投票決定」，兩岸都佔三成左右，台灣比大陸的高一些。這種民主的方式顯然比權威的方式來得受歡迎，「不討論，由某一個人決定」的方式很不受同學歡迎，「請師長仲裁」的方式則更是乏人問津，台灣低至 0.2%，大陸也只有 2%。可見兩岸大學生同儕團體之間溝通的方式還是傾向民主、排斥權威的。

綜上所述，同儕媒介對兩岸大學生的政治社會化影響情形是不同的，大陸大學生的同儕政治化程度比台灣的要高。

肆、大眾傳播媒介

依據 E. Emery 等人的解釋，大眾傳播乃指：傳播者應用已發展的媒介，向大多數的、不同的閱聽眾（audience）傳遞消息、意見和態度。在資訊時代，各種社會訊息透過現代化的傳播媒介，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影響著每一個人（引自葉佳文，2001：87）。N. B. Henry 所說的一點也不誇張：「全世界的人民幾乎沒有一日未覺得至少受到一種媒體為大眾傳播的工具，這些工具得以傳遞同樣的訊息給相互分散的、廣泛的大眾。」（N.B. Henry, 1954: 1）

一、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力

R. Dawson 與 K. Prewitt 的研究發現，政治社會化的傳播機構中，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Dawson & Prewitt, 1969：197）。Hyman 指出：在過渡的社會邁向現代化與政治整合的過程中，大眾傳播媒介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是有效的工具，能夠同時傳播統一及標準的政治消息給眾多的人民，它們的標準化足以產生舉國一致的行為模式（Hyman, 1963:142）。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人類的態度、信仰和行為上的影響並非是無所不能的。像 Chaffee 等人的研究顯示學生因常看電視有關公共事務的節目，及報紙的政治性消息，他們的政治知識已有顯著的增加，但是與涉入競選活動的行為之間的關聯性則很微弱（Chaffee, 1973：409）。其他的研究也指出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有其限度，例如認為大眾媒介對尚未根深蒂固的態度才具有最大的影響力，大眾媒介的主要影響是增強現有的政治定向，而不是改變舊有的定向或創造新的定向（Dawson & Prewitt, 1969: 198-199）。

不可否認的是，大眾傳播媒介相較於其他社會化媒介而言，仍然具有他者所未能及的易得性和廣泛性，不論是報紙、電視或是廣播，在大多數的國家都已經極為普及。Manheim 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生命週期的每一階段，將政治上有關的消息，以各種形式傳遞給個人，個人也因常依靠大眾傳播媒介

而獲取消息，因之大眾傳播媒介對於公民的政治事實的認知，將會有重要的影響。大眾媒介可能是提供個人政治和社會學習的有效而重要的媒體（Manheim, 1975: 64-65）。

二、大眾傳播媒介的政治社會化

任何傳播媒介本身都是受到政治的制約和影響的。西方傳播學者 Wilbur Schramm 提出：「媒介在社會裡的主要作用，是消息的過濾與廣泛傳播；從發生在社會中的一切新聞，選出可加報導的項目，經過製作，去供應廣大的受眾。」「任何一種廣播制度都或多或少會有政府的管制存在，最起碼的有廣播波段的分配，保障受眾不受誹謗性與淫穢性內容的侵害，保護版權所有人不受侵犯，同時維護政府不受煽動性言論的攻擊。……這也就是說，任何制度都會對傳媒作某種程度的管理與控制。」（余也魯譯，1985：158-185 頁）而且大眾傳播媒介有「單向宣傳」的缺點，即僅能由媒體本身依其意願，將其所欲播出之內容傳達給受眾，受眾無權選擇或變更其內容，只能選擇看（聽）或不看（聽），此種現象隨著近來 call-in 熱線盛行和網路媒介的興起而有些改變，但畢竟仍居少數。

大眾傳播主要透過政治輿論和政治訊息及其溝通影響人的政治觀念。輿論在公共團體生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輿論是人們關於社會人物、事件或社會生活其他方面的綜合性看法、這種相對多數的意志常常是個體或群體言行選擇的出發點。正如第四章曾經提到之「議題設定理論」（Protess & McCombs, 1991）以及「潛移默化理論」（Gerbner 等，1986 & 1994）的觀點，政治輿論會在國家政治動向方面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從而又導致更為廣泛的社會和政治生活領域的變動。分散的個人政治意見，只有透過一定的渠道和形式公開表達出來才能成為政治輿論，傳播媒介則承擔起這種公開表達的功能。政治輿論在國家管理體系中發揮及其有效的作用，是公民參與的特殊形式。政治輿論壓力作用的存在是民主政府長期獲得維持的關鍵因素（趙渭榮，2001：47）。

三、大眾傳播媒介政治社會化的分析

本研究測量大眾傳播媒介對大學生的政治影響，是從大學生對媒體的接觸頻次入手的，因素命名為「媒體接觸頻次」。編製的題目在問卷部分是：

- 3-25.您看電視新聞報導嗎？
- 3-27.您看報嗎？
- 3-31.您每天上網的時間？

兩岸大學生的作答情形如表 5-10 所示。受試者的回答依四種頻率從低到高分別得 1、2、3、4 分，故得分中位數是 7.5。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見表 5-11。

表 5-10：兩岸大學生接觸媒體的情形

因素名稱	台灣題號	樣本群組	樣本總數	從不看		每週看		每隔兩三天看		每天看	
				N	%	N	%	N	%	N	%
媒體接觸頻次	3-25 看電視新聞	台灣	550	9	1.6	75	13.6	238	43.3	228	41.5
		大陸	587	40	6.8	145	24.7	211	35.9	191	32.5
	3-27 看報	台灣	549	18	3.3	126	23	216	39.3	189	34.4
		大陸	586	31	5.3	205	35.0	210	35.8	140	23.9
	題號	樣本	樣本總數	30 分鐘以下		30 分鐘到 2 小時		2~6 小時		6 小時以上	
	3-31 每日上網時間	台灣	548	83	14.8	206	36.8	205	36.6	54	9.6
		大陸	587	163	27.8	246	41.9	136	23.2	42	7.2

註：N 代表選此種意見的有效樣本數，%代表有效百分比。

表 5-11：兩岸大學生大眾傳播媒介政治社會化獨立樣本 T 檢定

因素名稱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台灣	大陸	台灣	大陸	台灣	大陸	t 值	p 值
媒體接觸頻率	546	575	8.99	8.63	1.56	1.70	-3.766	.000***

註：* p<.05； **p<.01； ***p<.001。

從 T 檢定結果可以看出，兩岸大學生的得分均高出中間點許多，且二者間有顯著差異 (p<.001)，台灣學生較大陸學生的媒體接觸頻率為高。陳義彥學者 (1991) 調查中台灣大學生接觸大眾媒體有中上的程度，在中位數 15 的情況下得 19.05 分。可以說，媒體在台灣大學生的生活中是經常碰觸到的事物。

從具體答題情形來看，亦發現在接觸電視媒體、報紙媒體和網絡媒體三方面，都是台灣學生更為頻繁。這種情形一方面和兩岸新聞業發展的程度有關，台灣的媒體比大陸發達的多；另一方面也和學校設備和生活水準有關。據筆者瞭解，在大陸，大學規定學生必須住在學校宿舍，但人民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的學生宿舍都並未配置電視，僅有少數學生自行購買私自安裝，所以在大學期間接觸電視的機會相對較少。雖然學校會為學生訂報紙，但僅限《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中共的機關報，屬於意識形態強烈、所報導之

新聞經過嚴格審查，訊息的親和性與可讀性不太高。相形之下，這三所大學的網路建設比較發達，學生上網比較方便。因此會影響受試者的媒體接觸頻次。

兩岸大學生受大眾傳播媒介的政治社會化影響是有差異的，台灣大學生接觸媒體的頻次更高。

第二節 兩岸大學生的人格特質分析

心理學家 V. Barnouw 認為人格是：「導致個人行為一致性的價值（value）、態度(attitude)和知覺（perception）範式的複合體。」（瞿海源、許大柱譯，1987：14）Greenstein(1969: 3) 則指出，人格學家在論定人格時，主要是涉及認知(cognition)、情感（affect）和認同（identification）等主要字眼。

人格多被心理學者視為一種充滿矛盾的事物。特質理論（trait theories）家認為人格是具相當穩定性的事物，因此他們希望用以解釋人類在不同時期的相同行為；學習理論家則認為人格受心理境所改變，他們希望據以解釋人類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行為（陳駿德，1995：204）。

對人格的研究要注意，如 R.S. Sigel (1970: 277)所說：「不要把所有政治行動的解釋簡化為心裡的動機。……當我們說人格在政治上扮演一部份角色時，我們必須知道：人格只能解釋變異的一部份，而且要瞭解：政治系統、團體共有的信仰，以及很多其他外在的因素，綜合起來佔著更大的部份。只有當這些因素無法對某一政治行動做適當的解釋時，我們才成仰賴人格作補充的解釋。」

人格中的某些核心層面，是根深蒂固而難以改變的，但是某些外圍的層面，則是可以依經驗而適時修正的。正是因為人格具有穩定性和變遷性、又兼具獨特性與共同點，且是無法直接經驗觀察的事物，學者對人格多以問卷形式的量表來進行實徵性測量。

兩岸同屬華人社會，中國傳統文化之積澱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性在人格層面的影響至今可見；同時，兩岸又都在向現代化社會變遷，此一進程中個人人格也逐漸出現現代性的特質。如何測量兩岸大學生的人格結構呢？本文借鏡前人的研究，編制了兩個獨立的量表——權威人格和現代性人格量表，據第四章第二節的分析，此二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分別抽取出「權威人格」和「現代性人格」兩個因素。本研究的假設六是：「兩岸大學生的人格特質是有差異的」。所以本節的重點在於分析兩岸受試者在人格的權威性和現代性上表現如何。此假設可以分為兩個子假設：

假設六之 1：兩岸大學生的權威人格有差異。

假設六之 2：兩岸大學生的現代性人格有差異。

以下分別檢驗之。

壹、權威人格

學者彭立忠（1985：63）綜合前人的研究指出，中國儒家思想的發展，孕育出追求正統及崇古的價值觀，一方面符合朝廷帝王鞏固政治權威的需要，另一方面無違民間家族遵古孝道的心理，故能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顯學。崇古的價值取向與缺乏包容異己的一元化思想，皆是構成權威性人格的重要成份。

一、兩岸權威人格的歷史積澱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封建父權家長制度有幾千年的歷史。此一制度下，父親做為家長擁有主要的權力，居於家中的統治地位，這種權威透過家族化的歷程傳遞到地方官，進而至統治全國的皇帝，使官吏和君主在人們心中也有如父的絕對權威，形成「父為子綱、官為民綱、君為臣綱」的權威結構。權力者的專制行為主要表現在：經濟專制（家長掌控家族財產的絕對所有權和支配權）、思想專制（家中之意志和是非標準由家長訂定，以絕對服從為前提）、家規家法（其制訂和執行都強調「嚴」）、尊卑等級（尊卑、上下、長幼皆有嚴格的區分和等級，不可逾越）四個方面（王玉波，1984：35）。在家族內外，自幼長期生活在這樣的專制環境中，自然會形成一種過份重視、崇拜及依賴權威的心理與行為傾向。

二、權威人格的特徵

學者楊國樞將中國人心理的權威取向歸納為三點：（1）權威敏感：傳統中國人對權威的存在非常警覺和敏感，無論在任何場合，總會細心觀察或留意，看是否有現成的權威在現場，以輩份、年齡和職位為判準，弄清楚誰是超乎自己的權威。中國人自小就學會如何對上和對下兩種基本的待人方式，對傳統中國人而言，在任何角色關係中，除非確知自己是權威，否則最好視對方為權威，以對上的方式待之。這樣的策略是傳統中國人的一種為人處世的安全措施，表露出他們對權威的敏感及對冒犯權威的焦慮。（2）權威崇拜：中國人對權威的崇拜有明顯的絕對性，權威是可信的、全能的、永遠的，對權威的崇拜無條件，在範圍上漫無限制，在時間上也無侷限。（3）權威依賴：面對權威時，人們會產生暫時的心理無能（psychological disability）徵候；會絕對無條件的服從，服從可使自己獲利（楊國樞，2002：96-99）。

這種對權威敏感、依賴權威的習慣性安全措施，經過文化傳遞的過程，在當代兩岸的大學生的心理和行爲中仍然可以看到影子。不過，有些已被視爲是謙虛的一部份了。

學者 Adorno 等人（引自陳義彥，1977：228），認爲權威人格較強的人，在心理上有下列九項特徵：

- （1）傳統主義（conventionalism）——僵硬的、食古不化的接受和依附於傳統的價值觀念。
- （2）權威性的服從（authoritarian submission）——毫不考慮的接受自己團體的、經過理想化的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ies）。
- （3）權威性的侵略（authoritarian aggression）——趨向於譴責、排擠和處罰違反習俗或傳統價值觀念的人。
- （4）反對省察（anti-intrapeception）——態度嚴肅而且輕視生活中的主觀、想向、及柔和的一面。
- （5）迷信（superstition）與刻板映象（stereotype）——相信命運，對一切抱著聽天由命的態度，傾向於嚴格的分類。
- （6）重視權勢（power）與嚴峻（toughness）——易與權勢人物相認同，學習並模仿權勢人物，強調力量和強硬手段的重要性。
- （7）破壞性（destructiveness）與冷嘲熱諷的態度(cynicism) ——對人常具有敵意，並加以毀謗。
- （8）投射作用（projectivity）——把本身的沮喪挫折，投射到社會上公認的異端及敵人身上，以滿足潛意識的情緒衝動（unconscious emotional impulses）。
- （9）對性的偏執（preoccupation with sex）——對性的事件常誇大其詞。

上述學者所言及之人格涵蓋的層面很廣。權威人格的許多特徵，或多或少都與政治行爲有相當程度的關係，如：對屬下之統治支配慾；對上級的順從屈服，以及對於權力關係的敏感；需要以高度組織的方式來瞭解整個世界；喜歡堅持慣例傳統中的任何價值等。

筆者看來，Adorno 所歸納之權威人格第一項特質「依附傳統主義的價值觀」與民主意識所提倡的民主價值相對立；第二項「服從權威」與平等、自由概念相抵觸；第三項「權威性的侵略」（排擠責罰違背傳統價值觀念的人）以及第七項「對人有敵意並加以毀謗」又和多元、寬容價值相不符；第六項「重視權勢、嚴峻」排斥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自主。

貳、現代性人格

楊國樞認為，所謂個人現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是指現代化社會中個人最常具有的一套認知態度、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及行為模式（楊國樞，2002：330），本文以現代性人格稱之，和權威人格相對應。

一、現代性人格與現代化的關係

個人現代性的概念來自現代化理論，現代性是現代化的後果和內涵。現代工商社會有其獨特的經濟形態與社會結構，長久生活其中的人，必會形成一套獨特的價值觀念、思想形態及行為模式。而在邁向工商業化的過程中，個人心理與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而變遷。

歷史學家 C. E. Black 將現代化定義為：「科學革命以來，人類知識遽增，科學逐漸能左右人類生存的環境，以往的風俗習制必須隨著改變，以適應新環境的要求。此一適應的過程即是現代化。」（郭正昭譯，1972：7）現代化理論中將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二元截然對立的觀點是過於簡化的，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現代社會中含有不少傳統社會的文化特徵（Trommsdorff, 1983: 345）。另外，現代化理論中認為「傳統社會的文化特徵對一個社會的現代化有妨礙」的觀點也受到嚴厲的批評，Apter(1965)對於非洲的研究發現，有些傳統的社會文化因素對現代化有促進作用。

現代化包括社會現代化(societal modernization)和個人現代化(individual modernization)兩個不同層次，前者是指整個社會在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等方面的變遷，如都市化、工業化、民主政治、高科學和教育水準、有效率的大眾傳播網等；後者則社會中個人在價值觀念、思想形態及生活習慣等方面朝向利於在現代社會生活的變遷，這種變遷後所形成的特質便是現代性，具備這種特質的人可以稱為具有現代性人格（楊國樞、瞿海源，1974：2）。本文關注的重點在個人現代性部分。

二、現代性人格的特徵

探討個人現代性的西方學者頗多，最著名者有 Armer、Youtz、Dawson、Doob、Guthrie、Inkeles 和 Kahl 等人。Inkeles 認為現代人在態度意見與價值觀念上，有下述九項特徵：

(1) 現代人願意接受新經驗，樂於更新和變遷。(2) 現代人對於他的直接環境與較廣闊的環境中所引起的種種問題，能夠形成意見，提出主張，且其意見相當民主，即承認個人態度與意見的歧異，而不怕它損害到自己的意見。(3) 現代人重視現在及未來，而不重視過去。(4) 現代人更能從事計畫、重視組織、將之視為處理生活的方式。(5) 現代人相信個人能夠學習控

制環境，以實現他的目的，而不受環境所控制。(6) 現代人相信他的環境是可靠的，在他周圍的人及組織，能夠履行他們的義務及責任。他不相信命運或個人特殊的品質可以決定一切，而相信個人的力量能夠建立一個有規律的世界。(7) 現代人能夠顧及別人的尊重，並且尊重他們。(8) 現代人對科學與技術有更大的信心。(9) 現代人贊成公平分配的原則(引自詹長皓，1987：176-177)。

Kahl 指出的現代人的典型特徵還包括：進取的生活態度，喜歡都市，肯定普通公民的影響力，積極利用大眾傳播、討論公共事務。上述這些特徵和民主意識中的自主、自由、平等、多元包容價值等是可以共容的(Kahl, 1966: 133)。

如同研究現代化一樣，在研究個人現代性（現代性人格）時不能將其與個人傳統性（權威人格）全然對立起來。因為人格心理結構相較於社會制度結構是屬於更為複雜和穩定的事物，社會環境的改變會刺激人類心理行為作相應的調適，然而原有養成並傳至後代的一些心理習慣並不會快速且完全的被替代。也就是說，很難有一個人在向現代化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便已擁有純粹的現代性人格，權威人格也許尚潛存在其心理結構的底層，即使是兩種人格共存在於同一個人體內也並不稀奇。這種現象在急遽向現代化轉型的社會尤為多見。如在實際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同一個人在不同的生活範疇中其言行常會表現出相當不同的現代化程度：有的人對政治問題的言行表現的很現代化，但在家庭生活中卻又傾向權威，而宗教生活中可能又是另一種情形。

參、兩岸大學生人格特質之比較

早期學者多將權威人格和現代性人格視為同一變項的對立兩點，這種設計在研究中多會觸礁，所以本文採取楊國樞、瞿海源等學者經二十年不斷嘗試和改進而提出之觀點，把權威人格和現代性人格看做兩個相互分離的不同變項，且從多範疇來測量其人格特質（楊國樞，2002：335）。

一、兩岸大學生的權威人格之比較

本研究之測量工具權威人格量表是由權威人格因素組成，共包含四道題目。每一題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為五種程度，分別得 1、2、3、4、5 分。得分越高，權威人格越強。權威人格因素的得分區間中位數是 12 分。這四題分別是：

- 1-67.假如我們能夠設法除去那些不道德的、爲非作歹的人，那麼我們大部分的社會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 1-68.凡事先聽長輩的意見再做決定。
- 1-69.如果大家都能少說話多做事，那麼人人的境況都會變好一點。
- 1-70.在團體中意見不一致時，應該少數服從多數。

兩岸大學生的作答情形如表 5-12。

表 5-12：兩岸大學生的權威人格表現

題號	台灣					大陸				
	樣本總數	支持		反對		樣本總數	支持		反對	
		N	%	N	%		N	%	N	%
1-67	560	305	54.5	156	27.8	593	169	28.5	293	49.4
1-68	560	210	37.5	180	32.1	592	161	27.2	258	43.5
1-69	560	435	77.7	57	10.2	591	314	53.1	137	23.2
1-70	560	413	73.8	57	10.2	591	279	47.2	162	27.4

註：N 代表選此種意見的有效樣本數，%代表有效百分比；「支持」含「同意」和「非常同意」，「反對」含「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無意見」者不列入。

對「權威人格」因素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5-13 所示。

表 5-13: 「權威人格」T 檢定

因素	有效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台灣	大陸	台灣	大陸	台灣	大陸	t 值	p 值
權威人格	560	589	14.03	12.18	2.31	2.42	-13.239	.000***

註：* p< .05； **p< .01； ***p< .001。

從檢定結果看出，兩岸大學生在權威人格因素上的得分均高於中位數 12，台灣大學生的權威人格尤比大陸學生來得高一些 (p<.001)，這點可能讓自詡民主程度較大陸高明的人有些錯愕。

過去的一些研究指出，台灣大學生權威人格的平均得分爲 35.91，高出中位數 35 一點點 (陳義彥，1991)。詹長皓 (1987) 的調查發現台灣大學生的權威人格平均分爲 4.243 分 (中位數是 4 分)，和本研究的發現頗爲類似。而張善楠 (2000) 比較台灣、大陸、香港、新加坡四地華人社會的大學生的權威主義，結果發現新加坡的大學生權威意識最高 (10.47)，大陸次之 (8.71)，台灣再次之 (7.24)，香港學生的權威意識最低 (6.71)。本研究調查的結果，與張善楠的發現不同。

二、兩岸大學生現代性人格之比較

本研究在測量現代性人格量表之「現代性人格」因素時，共編製五道題目。每一題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為五種程度，分別得 1、2、3、4、5 分。得分越高，現代性人格越強。現代性人格因素的得分區間中位數是 15 分。題目如下：

- 1-73.丈夫死後，妻子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再婚。
- 1-74.移情別戀者是最沒有良心的人。
- 1-75.祭祖、婚嫁、喪事等應該按照固定的形式與典禮進行，不應任意更改。
- 1-76.在校學生應該專心讀書求學，不要為社會上的事情去分心。
- 1-78.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兩岸大學生的作答情形如表 5-14 所示。

表 5-14：兩岸大學生的現代性人格表現

題號	台灣					大陸				
	有效樣本總數	支持		反對		有效樣本總數	支持		反對	
		N	%	N	%		N	%	N	%
1-73	560	520	92.9	14	2.5	591	529	89.5	24	4.1
1-74	560	92	16.5	303	54.1	593	82	13.8	334	56.4
1-75	560	56	10.0	346	61.8	593	101	17.0	330	55.6
1-76	560	32	5.7	455	81.3	593	49	8.3	454	76.6
1-78	560	91	16.3	292	52.2	592	53	9.0	386	65.2

註：N 代表選此種意見的有效樣本數，%代表有效百分比；「支持」含「同意」和「非常同意」，「反對」含「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無意見」者不列入。

對「現代性人格」因素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5-15 所示。

表 5-15：「現代性人格」T 檢定

因素	有效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台灣	大陸	台灣	大陸	台灣	大陸	t 值	p 值
現代性人格	560	591	18.84	18.87	2.69	2.31	.143	.886 n.s.

註：* $p < .05$ ； ** $p < .01$ ； *** $p < .001$ ，n.s.表示統計上無顯著意義。

從上表得知，兩岸大學生的現代性人格得分都很高，超出中位數（15）許多，可見他們的人格呈現明顯的現代性。兩岸學生的現代性程度相差無幾，差異不顯著（ $p > .05$ ）。假設六之 2「兩岸大學生的現代性人格特質有差異」不成立。

本研究對台灣大學生現代性人格的發現和陳義彥（1991）之研究結果接近，他的調查台灣大學生在人格現代性量表中得分平均數是 44.39，在中上程度（中位數是 35）。比起詹長皓（1987）研究，台灣大學生的現代性程度是正向的「輕微」（得分平均數是 5.1，其評分標準是 5 分屬於「輕微」），當今大學生人格的現代性有升高的傾向。目前，台灣社會的都市化、工業化程度很高，民主政治已建立，大眾傳播網絡非常有效率，已然具備相當的現代化水準。中共雖然自稱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但在改革開放政策推動以來，目前全國的現代化進程已有若干成效，尤其在某些重點城市，更具有相當規模。本研究調查之大學生正是在現代化碩果的滋養下成長的一代，所以他們的現代性特質也就比較明顯。

從具體題目來看，台灣大學生對兩性平等、尊重情感、積極進取等方面的支持都比大陸大學生要高，只有在孝道觀念上表現的比大陸學生要傳統一些。在台灣，孝道是學校中課內與課外所教導或強調的主要德目或德行，如楊國樞（2002：51）所言：「長期影響的結果，學生在孝道態度上以高度敏感化與意識化，在孝道行為上則已高度增強化與實踐化。」在大陸，一方面學校教育中並不以孝道教育為重，而以愛國為德行的首位；另一方面，「計畫生育」（一胎化）國策的長期實行也淡化了傳統的傳宗接代觀念。故而台灣大學生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不如大陸大學生反對得那麼強烈。

三、小結

綜合對兩種人格的分析，我們發現兩岸大學生的人格特質中都包含有權威和現代性的部份，可見中華傳統文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影響並存。兩岸大學生權威人格、現代性人格均高於中位數。相互比較，台灣大學生的權威人格比大陸學生更明顯，彼此差異顯著；但是在現代性人格取向上，二者則無太大差異。

兩岸同處於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進程中，二者發展的快慢與程度不同。在這過程裡，人們的人格特質並不會遽然轉變，會在不同的方面表現出混合的特質。因此本研究並不將權威人格和現代性人格視為對立的兩點，而是把它們看做相互分離的不同變項。研究結果也顯示了兩種人格特質是共存於兩岸大學生心理中的。雖然說，台灣的現代化水準較大陸高，但台灣社會在日常人倫和生活習俗實際上比大陸保留了更多的傳統色彩，大陸曾經經歷了文革浩劫，許多傳統都在「破四舊」³⁸中被遺棄了，後生的一代與傳統不免產生隔閡。兩岸的社會在不同的歷史發展下產生的差異，也許是造成兩岸大學生在權威人格和現代性人格形成上有所不同的原因，但仍須後續研究者對此進行更深入之探索與研究。

³⁸ 破四舊：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首次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創造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

第三節 兩岸大學生的政治參與意向

政治參與乃是維繫民主穩定所必須，若民眾皆不參與，則政治易操縱於政客手中（黃秀端，1995：69）。民主社會中有較多的成員對其公民身份有所認知及行動，就有較多的人投入公共領域關心公共事務，民主的公民文化才得以紮根（張秀雄、黃景裕，2002：289），因此民主之發展有賴政治參與功能的發揮。

壹、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係指政治成員以各種方法直接或間接介入政治事務，其主要政治成員以各種方法直接或間接介入政治事務，其主要目的乃是希望經由政治參與或滿足自我心理、物質的需求，或嘗試影響政府決策以促成自我或團體目標的達成（林嘉誠，1980：27）。

西方學者 Scaff（1975: 83）認為政治參與可以區別為兩種基本概念。第一種是交互性行動，為政治參與是植基於個體認同社區公益之上的一種政治活動。為了促進共同的目標，個體公民平等參與決策過程，互信互賴以進行公開溝通，從而作成公平分配資源參考的各種決策；第二種政治參與是一種工具性的行動，是影響權力分配的一種政治活動，也是公民企圖以極小的代價追求極大的利益的一種交易行動，透過這種行動，一般公民可以從相互競爭的少數政治菁英做一選擇，從而賦予政治權力，使其擁有施政的正當性，一方面也可以表達其需求或支持，使得政治菁英不敢忽視其需求，並確保政治菁英的回應。這兩種概念可以概括在表 5-16。

表 5-16：政治參與的兩種基本概念

區別標準	交互性行動	工具性行動
主要界定詞語	分擔共享	參與加入
價值取向	互惠	競爭
行動類型	公民彼此溝通	公民影響菁英
行動目的	公道	權力
功能	促進自我實現 增進政治知識 孕育政治美德	保障權利 擴大權益 確保正當性

（引自郭秋永，1993：24）

從心理層面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來分析，陳義彥 (1991: 68-69) 認為政治參與大致可歸納狹義和廣義兩大類。狹義的政治參與範圍只局限於公民企圖影響政府的實際行為 (actual behavior)。持此種看法的學者，以 Norman H. Nie 和 Sidney Verba 共同提出的定義為代表。他們所謂的政治參與係「指涉個別公民的合法行動，這些行動的目的，多少直接影響政府人事的甄選及 (或) 政府人員所採取的行動。」(Nie & Verba, 1975:1) 狹義的政治參與觀點強調：(1) 影響政府人員的甄選或政府人員所做抉擇的行動；(2) 只注重參與的各種活動 (participatory activities)，而不包括參與的動機、態度、興趣等等心理的定向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3) 大部分著重於政府的參與，而不注意其他領域——如家庭、學校、自由結社等等——的參與；(4) 只涉及「在系統內」的活動——亦即影響政治的合法方式 (legal ways of influencing politics)，因此不包括像騷動、刺殺及等等非法的活動 (Nie & Verba, 1975: 2-3)。

廣義的政治參與，則不單指影響政府的實際行為，而且還包括態度、觀念、動機等心理定向。這一說法，認為必須先瞭解什麼樣的活動才能構成政治參與。然而這個問題並不簡單，因為有的人付出全部的時間與精力來從事政治活動；有的人則保存著興趣，但卻是個消極的旁觀者；另有些人認為政治是必須時時予以注意，而且人人負有關心問題的責任；還有些人，則只有在危急的時刻，才從事政治活動。因此參與的行動，其範圍也從消極的不作為到積極的作為；從對政治表示冷漠 (apathy) 到如 Lester W. Milbrath 所說的「格鬥性的活動」(gladiatorial activities) 等不一而足 (Milbrath, 1971: 9-29)。

基於一般大眾的政治參與具有多樣與多層次的方面，因此，有學者認為政治參與「包括相當簡單、普遍、且容易的活動，如像投票，討論政治，探求消息，對政治感到興趣，及參加政治組織。」(Palma, 1970: 2-3) 換句話說，關心政治就是政治介入。所以，當一個人聆聽政見發表會，關心選舉的結果，都可以作為測量一個人政治參與的指標。主張此種觀點的學者頗不乏人，像 Almond 和 Verba (張明澍譯，1996: 135-231) 就是以政治效能感與責任感來探討美、英、德、義、墨西哥等五國人民的政治參與。而 Berelson 則除了投票外，亦以政治興趣作為測量政治參與的主要指標 (Berelson, 1954)。

貳、兩岸大學生的政治參與意向

若以狹義觀點來定義政治參與，本研究所調查的對象正值求學階段，對於受調查時最近舉辦過的選舉活動多數尚無投票權，兩岸的受試者皆無直接參與政治活動的表現。³⁹所以本研究必須採取廣義的觀點，從大學生的態度、觀念、動機等心理定向來考察他們未來政治活動的參與傾向。陳義彥（1991：69）同樣也是從這個角度來窺探大學生的政治參與意向的。本研究曾假設：「兩岸大學生的政治參與意向會有差異」（假設九）、「個人屬性不同的大學生，其政治參與意向會有差異」（假設十），這些假設是否成立，將在以下分析中驗證。

Nie & Verba（1972: 27-28）採取廣義的觀點，建構出政治參與的五種類型：（1）公民主動接觸，如打電話給政府相關人員，與官員從事政治討論等；（2）合作活動，如籌組團體，結合他人影響政府的人事或施政；（3）投票；（4）參與政黨競選活動；（5）抗議行為，如示威遊行、連署請願等。

Theiss-Morse 對政治參與的類型還認為有「接受政治訊息」（being informed）（引自廖添富等，1998：5）。隨著人類已進入資訊時代（Information Age），媒體的發達和網路的興起，人們政治參與的方式也顯得更為多元化。

本研究綜合各學者觀點，並結合兩岸大學生的實際生活，設計了九道題目來考察其政治參與意向。題目涉及大學生與政府官員、民意代表主動接觸的意向、投票意向、抗議行為意向、利用媒體表達個人意見以及關注政治活動訊息等方面。該量表的 Cronbach α 信度係數是 .604，與陳義彥（1991）之結果接近（信度係數 .62），應屬於穩定量表。獨立樣本 T 檢定如表 5-17 所示。

表 5-17：兩岸大學生政治參與意向獨立樣本 T 檢定

	有效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台灣	大陸	台灣	大陸	台灣	大陸	t 值	p 值
政治參與意向	560	593	18.479	19.379	2.252	3.358	5.338	.000***

註：* $p < .05$ ** $p < .01$ *** $p < .05$ 。

本量表的最高得分是 26，最低得分是 9，所以中位數是 17.5。台灣和大陸大學生的得分平均數均高於中點，可見兩岸受測者的政治參與意向偏高。T 檢定顯著性是 $p < .001$ ，表示兩岸樣本有顯著差異，大陸大學生的政治參與

³⁹本研究（2003）指涉的對象係尚在求學階段的大學生，依據調查樣本統計結果顯示，台灣有 61% 的大學生在 2001 立委選舉或者 2002 年的北高市長選舉時因為年齡關係並未能投票；而大陸的大學生因考取大學，戶口隨之遷至其就讀學校所在地（北京或廣州），恰恰此二城市距離本調查最近依次之區人大代表選舉（五年一屆）是在 1998 年 12 月（當時大多數受測者未有投票權）

意向比台灣大學生高。因此，「兩岸大學生的政治參與會有差異」此一假設成立。兩岸受試者在具體問題上的作答情形分別見表 5-18 和表 5-19。

表 5-18：兩岸大學生政治參與意向

台灣（大陸）問卷題目	台灣		大陸	
	會 N (%)	否 N (%)	會 N (%)	否 N (%)
2-10(10).是否會參與投票	401 (72.5)	152 (27.5)	487 (82.4)	104 (17.6)
2-20(14).是否會向政府官員表達意見	67 (12.0)	490 (88.0)	269 (45.6)	321 (54.4)
2-21(15).是否會向民意代表表達意見	86 (15.4)	472 (84.6)	354 (60.0)	236 (40.0)
2-22(16).會否向報社投書或參與 call-in?	70 (12.5)	488 (87.5)	380 (64.2)	212 (35.8)
2-23(17).是否會參與群眾示威遊行?	80 (14.3)	478 (85.7)	297 (50.2)	295 (49.8)

註：N 代表選此種意見的有效樣本數，% 代表有效百分比。完整題目詳見附錄問卷。

據表 5-18 顯示，兩岸大學生參與選舉投票的意願都頗高（台灣達 72.5%、大陸 82.4%）。但是台灣大學生主動向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反映意見、以及利用媒體表達個人觀點或抗議的比率甚低，遠不如大陸學生的參與意向。每當大陸社會發生群眾動員的抗議事件時，台灣的媒體通常以異樣的眼光報導，認為這些群眾的參與行為是受到官方幕後的策動。本問卷的調查結果則顯示並不盡然，大陸青年政治參與的熱情和意願其實是遠高於台灣社會的。

表 5-19：兩岸大學生對政治的關注

台灣（大陸）問卷題目	台灣		大陸	
	N	平均得分	N	平均得分
3-29(3-28) 關注政治議題	550	2.87	592	3.88
3-30(3-29) 注意報章雜誌及電視中的政治報導	549	2.87	592	3.13
3-32(3-31) 注意網路上的政治新聞	548	2.42	590	3.05
3-33(3-32) 在網路上討論政治議題	546	1.16	588	2.08

註：N 代表有效樣本數。此四題的選項依「從不」、「很少」、「有時」、「時常」四種等級分別得 1、2、3、4 分，得分中間值為 2.5。

兩岸大學生都很關注政治，大陸學生的態度更為積極。公信力較高的傳統媒介，如報紙雜誌和電視，所提供的政治訊息更受大學生關注。台灣大學生注意網路政治新聞的比率並不高，比大陸大學生更低出許多。這種差異反映了兩地的媒體影響差別：在台灣，由於媒體的發達和資訊流通的自由，傳統媒介的政治訊息是很豐富的，而網路訊息的往往比較混雜且可信度低，故而大學生很少在網路上關注政治訊息。但在大陸，新聞的不自由在傳統媒介的限制尤然，網路則具有相對豐富和多元的訊息含量，也成為大陸大學生取

得重大政治訊息的管道。⁴⁰

不過大多數受試者在網路上討論政治話題的意願則不高，這應該是受到網路文化特質的影響：多數人在網路使用中只願意做旁觀者，而願意上網發表政論的人則多為狂熱者，這也就是為什麼常看到網路上的言論總是比較煽動、激情的緣故。

第四節 本章小節

本章是對研究設計中的自變項（政治社會化媒介）、中介變項（人格特質）和依變項（政治參與意向）的考察。經由對兩岸大學生的比較分析，發現：

一、兩岸大學生受到不同的政治社會化媒介的影響是不同的。表現在：

1. 兩岸大學生的家庭政治社會化情形有差異，大陸大學生的家庭民主化程度比台灣高，台灣大學生家庭政治化程度比大陸高。
2. 兩岸的學校政治社會化媒介使大學生在學校民主模式這方面產生差異，大陸比台灣更為正向；但兩岸大學生對學校社團的參與都比較積極，無顯著差異。
3. 同儕媒介對兩岸大學生的政治社會化影響情形是不同的，大陸大學生的同儕政治化程度比台灣的要高。
4. 兩岸大學生受大眾傳播媒介的政治社會化影響是有差異的，台灣大學生接觸媒體的頻次更高。

二、兩岸大學生的人格特質兼具有權威人格與現代性人格雙重取向。表現在：

1. 兩岸大學生權威人格取向均高於中間值，台灣大學生的權威人格高於大陸大學生。

⁴⁰由於網路訊息的快速、多樣、與不確定性，大陸官方業已逐漸收縮網路言論的空間。根據外電報導，大陸網路監管部門要求所有大陸網站儘快登記，以免遭到關站或罰款的處罰。而根據巴黎的「無疆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WB）」指出，北京早在今年三月就宣布，大陸境內的網站必須在六月底之前完成註冊，並提供成立者的完整資訊，否則將會被視做非法網站。

RWB 引用大陸官方數據指出，目前已經有四分之三的境內網站已經依法完成註冊。RWB 表示，大陸政府希望將言論尺度不受限制的網站驅逐到海外，如此一來，有問題的言論將無法突破大陸的網路過濾制度進入大陸境內。事實上，近來大陸對網路言論監管更形緊縮，繼雅虎及 Google 之後，微軟 MSN 為了發展大陸市場，避免與大陸網路監管人員發生衝突，日前過濾在大陸的個人空間使用「民主」、「自由」、「人權」及「台灣獨立」等詞彙。參見《聯合報》2005/06/26，A16 版。

2. 兩岸大學生的現代性人格取向均遠高於中間值，兩岸學生不存在顯著差異。

三、兩岸大學生都具有較高的政治參與傾向，大陸學生的政治參與意向較台灣學生更高一些。

綜合上面三點的分析，本研究之假設四「兩岸大學生受不同社會化媒介影響的情形是不同的」、假設六之 1「兩岸大學生的權威人格有差異」和假設九「兩岸大學生的政治參與意向有差異」均獲得證實，但兩岸大學生的現代性人格則沒有顯著差異。